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 武昌首义对武汉经济发展的推动

王春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武昌首义使武汉由一个"九省通衢"的商埠,一夜之间成为了革命、政治的中心,全国瞩目,世界也为之震惊。作为首义之地,武汉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青睐,经济发展上受到扶持。湖北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北京政府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中国由此进入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期。武汉成了新经济制度的最大收益者,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纵观武昌首义前后武汉经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武汉除了原有的地理优势之外,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无疑是武昌首义之后武汉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关键词**:武昌首义;武汉经济;制度变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4-0117-10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素有"东方芝加哥"之美誉。武昌首义发生后,中国进入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期。武汉作为首义之地,是中国中部地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辛亥革命后,湖北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北京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建设,无疑对武汉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

## 一、武昌首义使武汉成为革命、政治的中心

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武汉也因首义而名扬天下。首义的成功,既和当时国内近代化浪潮的冲击有关,同时也和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长期艰苦工作分不开。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它既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和清政府统治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猛的地区,是全国各省革命党人联络的枢纽。国内和国外,革命和保守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使武昌成为新、旧势力较量的最前沿。

湖北新军是南方各省中的一支最精锐的劲旅。其官兵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如1905年,张之洞在湖北黄陂招数的96名新军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1]68他们易于接受新思想的影响,且手中掌握有武装。因此,是革命党人首先争取的对象。

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新军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许多革命青年,也以当兵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中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新军的标(团)、营、队(连)各级都推举了自己的代表并建立了基层组织。

由于文学社和共进会长期艰苦不懈地运动士兵,做"抬营工作",至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15000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1000多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这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并最终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武装基础。

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革命处于高潮。湖北革命

**收稿日期**:2006-08-27

**作者简介**:王春雷(1969-),男,河南南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党人决定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昌发动起义。

湖北革命党人原拟定10月6日即中秋节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充分而延期。10月9日,又因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致使起义准备遭受严重挫折,设在武昌指挥起义的秘密机构又遭到破坏。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被捕遇害,孙武受伤,蒋翊武逃匿。而孙中山尚在美国,黄兴和宋教仁也均不在武汉。革命党人顿呈群龙无首状。

面对如此突发事变,湖北革命党人表现出了英勇的大无畏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历史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了历史创造者的历史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率先发难,开枪击伤了企图镇压起义的排长陶启胜。首义的第一枪打响后,应者云集,一举占领了楚望台。紧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士兵纷纷倒戈,齐聚楚望台。发动起义的士兵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湖广总督瑞澂逃遁。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武昌,第二天清晨,九角十八星旗即飘扬在咨议局的旗杆上,武昌光复。江对岸的革命党人也闻风而动,分别至11日晚和12日晨光复汉阳和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已完全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

武昌首义震动了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至11月9日,短短一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省和上海等地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武昌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心地。

## 二、武昌首义后的经济制度建设

任何巨大的社会变革都会给经济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武昌首义后,武汉三镇受到战火破坏和政体突变的影响,工商业遭受巨大损失。许多重要工厂或毁于战火,或因战事而歇业。其中汉阳兵工厂受到严重破坏,部分厂房倒塌,机器设备半数荡然无存,无法开工运营。机器碾米厂也多数被毁。以至于纺织四局、汉阳铁厂以及官商办各大工厂大多不能开工,或不能全部开工,失业者大增。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形势的趋于稳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由此进入了“黄金时期”。

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如此奇迹,有国际因素“一战”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国内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给私人资本尤其是中小资本开办企业解除了一系列制度上的障碍;它所促成的兴办工业的浪潮,开化了社会风气,鼓动人们竞相投资于工业;它所激发的群众爱国心,掀起了提倡国货的热潮,为本国工业产品扩大了销路。更为重要的是此后各届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建设。

湖北军政府成立伊始,面对武汉三镇工厂停工,市面萧条,满目疮痍的战后局面,即陆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生产、保护和发展实业的政策。

首先,裁减厘税,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以“扫除苛政,收拾民心”为第一要务,“豁免钱漕,裁彻厘税”,其税率概货本值百抽二。

其次,维持实业,保护工业器具财产。军政府内务司组成农工保存处机关,对一些学堂及白沙洲造纸厂、布纱丝麻四局等器物财产,调查并注册查封,加以严格管理,防止财产受损及流失。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在武汉保护财产不下数百万金。同时,封存省内矿厂,保护矿产资源。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对战后重建及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湖北实业司成立之初,即督促各大工厂进行复工。湖北军政府实业司拨款数万元,帮助湖北造砖厂、官纸印刷厂等厂家开工,并对原有的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工厂进行整理,以使其尽快恢复生产能力。由于战火,导致大量失业贫民急需救济。为此,湖北军政府责成各属慈善团体及绅商,创办残疾人工厂、游民工厂等社会救济机构,使其自食其力。此举对于安置移民,恢复地方经济,稳

定社会秩序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农业方面，湖北军政府采取蠲免丁漕、保护农资等措施。蠲免丁漕方面，于 1911 年 10 月 15 日宣布，各种杂税，除为地方所有者，概行免除，并于 1912 年 2 月 2 日，颁布《钱漕暂行条例》。保护农资方面，对武汉周边农工场所及学堂农业器具财产，均加以注册封存保护。

再次，修堤建闸，加固堤坝，保护并经营基础设施。颁布《堤工公债简章》，以作修筑堤工之用。

南京临时政府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私人资本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把发展工商实业作为政府的重中之重。孙中山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为之要领。"[2]随后，其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发布了《保护人民财产令》，宣布一切私产，归人民享有。清政府官产，归民国政府享有。这一法令以法律形式体现了保护人民私有财产的精神，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发展。

为促进工商实业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实业部，并令各省设立实业司。明确实业部的职责在于"司理本国农工、商矿、山林、渔猎及度量衡"，积极推动各省实业的发展并制定了有关的经济法规。1912 年 3 月初，实业部制定了商业注册章程。南京临时政府还设立财政部，实行财政预算制度，统一币制，发行公债。还制定了《商业银行暂行条例》，保护商人，鼓励民间开设银行。此外，还积极倡导和支持社会经济团体的组建。1912 年 1 月 30 日，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宗旨为："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共有 23 个团体成立。民间团体的成立，为以后的实业振兴，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南京临时政府在其短暂的存在期内，竭尽所能为一个崭新经济体制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一一批准立案。遇有地方官侵夺私产，破坏营业者，无不彻底查清。由此为工商实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据《农商部统计报告》统计，辛亥革命前设厂数，1910 年 986 家，1911 年 787 家，而辛亥革命后设厂数，1912 年 1504 家，1913 年 1378 家。从对比中可明显看出，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作用之巨大。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延续和发展了这一经济政策，诸如鼓励提倡设立公司，扶持保护幼稚工商业等。创设公司需要法律的指引、规范和保护，1912 年 12 月 5 日，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上之物品及方法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得呈请专利"。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工艺品的发明者及改良者，废除了晚清的设厂专利垄断权，使中小资本得在各业各地自由设厂。1914 年 1 月 13 日，民国政府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规定，保息期自开业制造之日起，继续三年为保息期；第六年起每年按照所领保息金总额 1/24 摊还[3]。有力地扶植了国内贫弱的工商业，吸引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创设公司。从而使人们的求富求强思想得以有施展的渠道。1914 年 1—8 月，农商部还先后颁布了《公司条例》、《商人条例》、《公司条例实施细则》、《商业注册规则》及《施行细则》、《商业注册规则》及《施行细则》。这无疑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14 年 3 月 11 日、31 日，民国北京政府分别颁布了《矿业条例》和《矿业条例实行细则》，多方面照顾到了开矿者的利益。同年 5 月 3 日、6 日，又先后颁布了《矿业注册条例》和《矿业注册条例施行细则》。在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曾明确宣称，要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以此为振兴实业的方针。随后在引用外资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采用合资、借款、代办三种形势。

由于"一战"影响，人民群众提倡国货、反对洋货的爱国热情高涨。民国政府也推行了倡导使用国货的方针政策，于 1914 年 12 月 5 日，农商部奉大总统谕，通饬各省云，自欧战以来，出口滞呆，入口锐减，亟应提倡国货制造，凡出口足抵外货者，优给奖励。同时，积极主张参加国际博览会，开设国货展览馆，推广国货销场。

鼓励垦荒,奖励棉、糖、羊毛等农富业生产。1914 年 4 月 11 日,农商部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同年 3 月 3 日,11 月 6 日,农商部又先后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边荒承垦条例》。以此鼓励发展农业。

而农工商业能否顺利发展,又视其资金能否融通。1914 年 4 月 17 日,农商部会同财政部拟定《劝业银行条例》53 条,以放款于农、林、牧、垦、水利、矿产、工业等事业为目的,以此引导人民致力于发展实业。1915 年,又拟定了《农工银行条例》,为农副业生产融通资金。同年 12 月 29 日,又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以便利证券交易和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纵观武昌首义后的制度变迁,从湖北军政府到南京临时政府再到民国北京政府,虽然政局不断变化,但总的经济政策并无大的波折,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和传承性。经济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和深化,中国由此进入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期。在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但经济政策又保持相对的连续和稳定,使政治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减小到最低限度。这也许就是武昌首义后,一方面军阀混战,社会动荡而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仍保持相当高速的发展势头,并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奥秘所在。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武昌首义后新的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对武汉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 三、武昌首义后武汉经济的发展

由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进一步保护和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而作为首义的发生地,武汉首当其冲,武昌首义对其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作为首义之地,武汉受到众多革命领袖的青睐,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受到特别扶持。

辛亥革命时期,武汉三镇遭到战火的严重破坏,大批建筑及公用设施毁于战火,工厂大多被迫停工。1912 年 2 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湖北军政府也成立建筑公司筹备处,以西方城市和汉口租界市政为参照,绘制出汉口市政建设蓝图。同年 4 月 9 日,孙中山来汉视察了武汉三镇,抚慰战争疮痍,督促恢复建设,并重点视察了几家大型厂矿。对汉阳兵工厂,他指示应立即组织技术力量进行修复,并尽快开工。并对武汉经济发展做了全局性、历史性指导意义的设想。他指出“现在汉阳已有全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厂。武昌则有大纱厂。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为与世界交通唯一港。而铁路的修建,将使武汉的地位更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为达此目的,急需建设钢铁厂和水泥厂,诸大工程同时并举,水泥市场如此巨大。”[4]

此外,孙中山对武汉的市政建设也勾画了非常具体的蓝图,包括整治龙王庙至汉口租界的长江堤岸,改直汉水入江处,于长江边第一转弯处开凿过江隧道,在长江和汉水上多处建桥及城市向外围拓展等。

武汉也是黄兴求学和战斗过的地方,他对此地别有一番情结。1912 年 10 月,黄兴回湖南办实业,途经武汉。在汉口欢迎会上,描绘了武汉城市建设的蓝图。“重新展宽街市,沿流方向,取垂直路线,庶几不至有偏重之弊,且不数年川汉粤铁路交通,则人口商业当较前增加数百倍。”[5] 两位革命领袖人物当时对武汉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构想,尽管在当时还仅存在于构想阶段,但对武汉随后的发展建设不无启发作用。

1912 年,孙武在汉口花楼街建成三镇第一家大旅馆——汉口大旅馆。从此,使武汉服务业上

升一新台阶。1914 年 4 月 4 日，蛇山隧道竣工，大大改善了武昌的交通环境，便利了人民的生活。同年 6 月 20 日，巴拿马赛会湖北出品协会展览会在汉口华商赛马场开幕。翌年，汉口老朱章花缎、信记茶叶、姚春和铜器等 20 项产品获巴拿马赛会一等金牌奖，使汉口产品名扬海外。1916 年 1 月 8 日，美国寄来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中国教育品得奖单，湖北第一中学获金牌奖，武昌女子蚕桑学堂获铜牌奖[6]。

武昌首义后，随着经济近代化进程的迈进，各种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实业救国团体纷纷建立。1912 年初，“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在上海成立，湖北武汉的一些工商业者纷纷加入，对于推动民国初年武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武汉较有影响的全国性经济社团还有“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和“中华实业团”。1913 年 8 月，中华工程师会成立于汉口，成为国内唯一的包括土木、机械、水利、电机、采矿、冶金、兵工、造船八个专业的工程学术团体，为武汉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

民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由于一系列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法规，使得武汉的民族工业获得丰厚利润。由此使得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纷纷向工业投资，而其中尤以民族产业资本增长最快。从全国范围看，“自辛亥革命迄 1920 年，外国在华投资因欧战影响进入颓势，增长率仅有 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 3.8%，唯有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保持两位数，为 10.5%。”[7]

至 20 年代中期，武汉已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包括较大的手工作坊）约 600 家。这些厂分布 20 多个行业，以纺织工业最多，约 290 户；碾米业 90 余户，新建立的有 80 余户；印刷业 71 户，新建的有 34 户；机器业 58 户，新建立的有 40 户[8]9。

民国初年，由于“提倡实业，振兴国货之声浪，高唱入云，始有正式织布工业之设立焉。”[9]91“在武汉三镇，1912 年秋创办于硚口的积兴织布厂，是辛亥革命后武汉新建的第一家机器织布厂，有铁木机 30 台，生产花色布。到 1913 年，全省已有纺织印染厂 120 家，占全省工厂数的 1/5，有职工 7605 人，比清末有了较大的增长。这一时期全省的手工业纺织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染织作坊增加到 31 家，工人约 260 人，棉织业 38 家，工人 448 人。”[9]255而其机器设备大有改观，铁木混合脚踏机的比例明显上升，有的已经开始使用蒸气机作为动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武昌首义后，武汉地区民族资本纺织业发展较快。20 年代前后，先后兴建了武昌第一纱厂，武昌裕华纺织厂，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和震寰纺织厂（通称四大纱厂），开办资金 800 多万元。到 1925 年，武汉色织布业规模较大的工厂有 60 家，其中有 100 台布机以上的有模范、兴民等 17 家；针织袜业自 1912 年由部分转业旧军人开设袜厂起到 1926 年，发展到 190 户；棉织工业的纶章锦纶棉织厂、瑞昌棉织厂分别于 1915 年和 1919 年投产，两厂有织机 250 台；印染业在 1925 年开始采用机器整染棉布；丝织、毛巾等业也有发展。在此期间，武汉纺织工业生产能力仅次于上海，产品行销内地各省[9]609－610。

1915 年，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武昌第一纱厂）第一厂（即北厂、布厂）开始兴建，它是当时华中最大的纺织厂，占地 150 亩（后增至 300 亩）。仅车间厂房就有 500 多间，设有纺、织两厂，工人近 2000 名，是当时武汉人数最多的工厂之一。该厂设备先进，机器全部从英国进口。1919 年建成投产。至 1921 年获纯利 120 万银元，乃扩建南场，1923 年建成投产。全厂共有职工 8000余人，日产 20 支棉纱 160 大包和 12 磅细布 2 000 余匹。

1919 年，张松樵等人筹资组建的裕华纱厂，其生产设备仅次于第一纱厂，由于它避开外商的竞争，到川、陕、湘等内地开辟市场，又多方采取措施提高产品竞争能力等也盈利颇丰。

1912 年，武汉、上海商人在汉口仿制德国袜机，月产量达 100 余台，此仿制袜机性能好，价格

低,日产袜1打,深受商界和机户喜爱。

武汉的机器制造业,除了清末创办的汉阳兵工厂、扬子机器厂、铁路机厂、针钉厂及周恒顺机器厂等较著名的工厂外,民国前期资产在万元以上、产品精良的民营机器厂还有冠昌、吕方记、公记、针记袜机厂等。

在民国期间,武汉机械工业除修配外,以能制造轮船、舰只、200匹马力以内的蒸气机、煤气机、黑油动力机、锅炉、盐井提升全套设备以及新式织袜机、布机、毛巾机、砖瓦机、轧石机、轧花机、碾米机等各种机械设备。

扬子机器厂是武汉最大的机器厂,工人最多时达2000人。工厂分化铁、机器、电机、翻砂、桥梁、造船6大部。1911年扩充炼铁厂、炼钢厂,补充发电机、煤气制造机及滑道船坞,全部设备由外国引进。1919年修建化铁炉一座,1920年出铁,年产一万吨左右,为全国八大铁厂之一。该厂利用汉阳象鼻山的铁砂矿,聘请美国工程师,冶铸各种机械,并为海军制作了3艘500吨的军舰。

周恒顺机器厂是武汉历史最久的大型民营机器厂。1913年仿制成武汉第一台30匹马力卧式煤气机,并形成系列产品。先后仿制成25-30、50-60和80马力新型煤气机,可以用木炭、木柴、糠壳等代替,适合中国农村情况,大大提高了其适用范围,满足了各种小型发电、碾米、榨油工厂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战"期间,其生产盐井用的蒸汽起重机及造币机、制砖机、人力打包机、制针机、矿山机械和全套榨油设备等各种机械,并制造出大小火轮10艘,立式水冷二行程4缸120匹马力柴油机及100匹马力蒸气机,产品销至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等省,人力打包机还远销日本。

民国前期,新建民营面粉厂8家,资金共205万元。每家职工均在100人以上,日产面粉1.5万包左右,资金及日产量比清末增长1倍和近2倍。

1919年建立的福新第五面粉厂,其优质产品牡丹牌面粉,首创远销欧美各国,武汉也遂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面粉工业中心。

汉阳的兆丰机器碾米公司,是早期民营企业中规模最大的机器米厂。资本14万元,购有德国蒸气机2部,碾米机8部,大垒子3部,日产色白质优大米900担。

1923年,碾米业开始采用电动机代替蒸气机,第一家使用电动机的是顺兴恒米厂。至1925年,机器米厂发展的90多家。其中8家大厂,其余为小厂。这8家大厂日产精米1550担,年产约50万担。

民国以后,建立天盛榨油厂。改用铜质螺旋榨210个,为湖北有新型大规模榨油厂之开端。民国前期,民族资本开办的榨油厂共20余家。

火柴烛皂工业在民国前期也得到初步的建立和发展,至1918年,先后建立曹祥泰、汉昌(烛皂)、太平洋3家肥皂厂,共有资本11万元。1926年各厂纷纷扩充机器设备,引进日本技术,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使"警钟"、"旭日"等牌肥皂享誉武汉及湖北各县。

民国初直到1917年,汉口总商会会长李紫云集资20万元在硚口开设燧华火柴厂,日产黄磷火柴200箩,产品销省内及邻近各省。

1921年吴蕴初在汉阳设厂制造火柴原料氯酸钾,在汉口设炽昌硝碱制造厂,生产钾、氯、洋硝等化工原料。1925年又有商人在汉口设大冶炼油厂,提炼炼油产品。

1911年至1923年间,武汉建立新式制革作坊30多家,以宋炜臣开设的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1925年开设的民营第一制革厂、牛皮商创立的天胜制革厂规模较大。

蛋品工业在辛亥以前一直为外商所垄断,1912年刘子敬等合资开设华发蛋厂,1919年又独资设中华制蛋公司,并在河南漯河、郑州设新华和中华蛋厂,在外省各地设庄80多个收购蛋品。利

润丰厚，盛极一时。

民国前期建立有武昌电灯公司和汉阳电器公司。武昌电器公司创办于 1914 年，资金 45 万，有 300 匹马力发电机 2 部。汉阳民营电厂 1925 年由周恒顺厂主周伸宣等合资开办，既为工厂照明，又为示范推广周恒顺厂生产的煤气发电机。

1911—1927 年，民营砖瓦厂建立有阜成、华兴、富源 3 家。武汉建筑业资本家沈祝三于 1913 年建立阜成砖瓦厂及轧石厂、炼灰厂，逐步采用蒸气机为动力，机器制砖，以轮窑焙烧红砖红瓦，试制出空心砖和异形砖等品种达 13 个。这些建材，大大促进了武汉及周边城市建筑业的发展。为当时汉协盛营造了许多著名工程，如四明银行、盐业银行、景明银大楼、武汉大学、一纱厂等发挥了专重要作用[8]9-13。

我们纵观武昌首义前后，1911—1927 年，在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拥有万元资金以上的厂家有 52 家，在投资额和工厂规模水平上都比 1911 年前有较大增长。该时期 100 万元以上的工厂就有第一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六河沟扬子铁厂等 4 家。列表如下：

**1911—1927 年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与辛亥革命前比较表**

| 资金分组 | 1911 年前 | | 1911——1927 年 | | 1911 年后为 1911 年前的% |
|---|---|---|---|---|---|
| | 企业数 | 资金(万元) | 企业数 | 资金(万元) | (资金) |
| 100 万元以上 | 2 | 163.20 | 4 | 702.00 | 43.00 |
| 10——100 万以内 | 21 | 558.20 | 24 | 682.30 | 12.20 |
| 1——10 万以内 | 16 | 35.34 | 24 | 65.10 | 18.40 |
| 合计 | 39 | 756.34 | 52 | 1449.40 | 19.15 |

**资料来源：**《武汉市志·工业志》(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第 10 页

武昌首义后，洋行数量也有所增加。德商波尔文、利昌、多富、谦信等洋行结束了在汉的经营，但英国则一直以汉口为重要据点，保持着较大的贸易势力。各国新增洋行情况如下。

**1912——1924 年汉口新增欧美洋行数量及业务范围一览表**

| 国别 | 数量 | 业务范围 |
|---|---|---|
| 英国 | 11 家 | 电器材料，一般输出入，西药，饮料，洋服店，茶叶输出，输出入杂货，贩卖石碱等 |
| 美国 | 6 家 | 输入电器电料，建材，一般输出入，杂货输出入，贩卖药剂，文具、颜料等 |
| 法国 | 5 家 | 输出杂粮，桐油，猪鬃，保险业，药材，饮料，护膜输入，人力车租赁等 |
| 俄国 | 3 家 | 输出烟草，红茶 |
| 意大利 | 3 家 | 输出牛羊皮，油脂，杂粮，输入意大利酒，贩卖果子等 |
| 丹麦 | 2 家 | 输入机械类，金物等 |
| 瑞典 | 1 家 | 输出牛羊皮 |
| 荷兰 | 1 家 | 一般输入，保险 |
| 外商合办 | 3 家 | 牛乳，输出入杂货，饮料制造销售 |

**资料来源：**《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第 37—38 页

此外，洋行还在武汉兴建了 20 多个出口商品加工厂，包括制茶、肉禽蛋加工冷藏、精炼桐油、榨油、面粉加工和皮革、棉花、蓖麻、羽毛打包第业务。这些加工厂采用先进的动力机械设备，雇佣廉价的劳动力，均获丰厚利润。

民国初年，华商发展迅速。列表如下：

**民国初期华商行情况统计表**

| 单位 | 资本(万关两) | 成立年份 | 营业项目 | 年贸易额(万关两) |
|---|---|---|---|---|
| 聚兴诚国外贸易部 | 20 | 1914 | 出口:桐油,猪鬃,五倍子,羊毛<br>进口:五金,电料,钢铁 | 1924年:700—800<br>1925年:500－600 |
| 协和贸易公司 | 100 | 1924 | 出口:桐油,毛麻,猪肠衣皮油,猪鬃<br>进口:纸,地毯,椰子油,谷粉 | 1924年:120<br>1925年:280 |
| 隆昌贸易公司 | 40 | 1918 | 进口:玻璃,棉花,匹头, 五金 | |
| 华昌贸易公司 | | 1915 | 出口:矿砂,桐油<br>进口:机器,五金 | 约1000 |
| 得庸公司 | | 1919 | 出口:蛋品,芝麻,桐油<br>进口:铜,靛青,机器,颜料 | 约200 |
| 泰和公司 | 10 | 1925 | 出口:桐油,矿砂,茶叶, 棉花<br>进口:糖,米,麻袋,玻璃,电料 | |
| 鼎新公司 | 30 | | 出口:桐油,杂粮,猪鬃,药材<br>进口:紫铜,五金,匹头,杂货 | 500—600 |
| 义隆商业公司 | 10 | 1921 | 出口:蛋类,桐油,牛羊皮, 棉花<br>进口:五金,匹头,杂货 | 200－300 |
| 福中公司 | | | 出口:桐油,牛羊皮,棉花<br>进口:五金,匹头,杂货 | |

**资料来源**:《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46页

汉口作为湖北主要的商业中心,是本省及内地各省输出国内外货物的集散地。民国初年,随着武汉经济的逐步恢复,汉口商业日趋繁荣。到1918年,汉口已有182个行业,商店总数达1.7万家。其中有成衣、饮食、旅馆、医院共计4850余家。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传统商业组织及经营方式已经不再适应,而近代商业形式不断被采用,商会组织及各种公司迅速增加。

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资金融通量的增加,金融业也兴旺起来并进入鼎盛期。1912年,黄陂实业银行、鄂州兴业银行在汉口设立总行。由此开始,银行设立逐渐增多。到1920年,先后在汉口开业的本国银行达到30余家,至1926年,发展到52家。此间,外国银行也有所增加,到1924年初,总数达18家。据汉口《银行杂志》1925年记载,在汉口银行共达32家。外国银行这时增加到15家。当时武汉人口尚不足百万,而银行和钱庄数却达183家之多,且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

除银行增长外,武汉钱庄也非常活跃。武昌首义后,汉口对外贸易扩大,资金融通量激增,促进了钱庄的发展。至1919年底,武汉钱庄增加81家。其中汉口69家,武昌12家。1922年,汉口钱庄多至150家,武昌有30多家。1925年,汉口钱庄136家,资本总额为洋例银458万两。总行在沪、津、渝的中国、聚诚、金城、上海、四明等银行都在汉口设有分行,在本地还开设有黄陂商业、华丰等银行。

随着资金融通和金融活动的渗透领域不断扩大,其经营方式也从办理兑换、汇兑、短期拆放,进而注重吸收社会游资,办理出口押汇,开展抵押放款。据汉口17家银行、75家钱庄统计,1924年盈利达287万元。且汉口各银行业务不断向其他领域拓展,兴办了堆栈、仓库、保险公司及旅行社等。

该时期,武汉金融业务联系区域很广,汉口中国银行曾发行鄂、川、湘、陕、豫、赣、黔、晋八省都设有分支行、办事处、收兑处、寄庄等31处,“指挥调拨,兼顾并筹,悉由汉中行主持期间。”汉口交

通银行也曾在九江、长沙、开封等地设有支行。汉口的金银、外币、利率及汇率等金融行情，固然受上海影响，而又可左右湖北及湖南、河南、四川等相邻省的金融市场，成为我国内地的金融中心[10]。

武昌首义后，武汉市内电话除汉口“租界电话”外，均改由鄂省行政公署代管，官督商办，资产仍归商办电话公司。1914 年，交通部出资 18 万元将武汉商办电话收归国有；1915 年高恩洪以中国国家电话总局局长名义，与德租界当局及西门子洋行代表谈判，出资 9 万元购回汉口租界内 400 余号电话，将汉口“租界电话”收回。至此，武汉市内电话始有交通部统一管理。

1916 年 1 月 18 日交通部与中国实业有限公司订立汉口、武昌两处共电式电话交换机装置合同，并在汉口合作路口兴建新式四层楼电话大厦，1917 年 5 月 12 日汉口电话局迁入新址，定名为武汉电话局。武昌电话分局于 1916 年在蛇山山头购地建房，1917 年竣工，1918 年迁入新址。1921 年秋，因汉阳电话用户增多，乃觅租汉阳高公桥头一栋民房，设立汉阳电话分局。1926 年武汉电话局与济生公司订立合同，在汉口济生马路设立分局。

武昌首义后，于 1912 年冬，交通部即向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定购了 5 部瞬灭火花式电台，分别在张家口、吴淞、广州、武昌、福州装设无线电台。同年，武汉长波无线电台建成，武汉成为中国第一批建立无线电通讯的城市之一。1914 年，武昌大东门无线电台建成，是为武汉地区使用无线电报之开端[11]。

## 四、历史的启示

纵观历史，武汉经济的发展，除与武汉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外，也与其曾经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有关。武昌首义后，武汉作为政治革命风暴的中心，全国瞩目，世界也为之震动。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民国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武汉的影响首当其冲。武汉对新制度的受益得天独厚，作为首义之地，不断受到领袖人物的青睐和政策、经济上的扶持，使武汉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此外，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突破了社会转型中制度改革中的最坚固环节。由此，中国进入了政府主导下的主动现代化时期，社会转型的速度明显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南京临时政府与民国北京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有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连续性，由此使得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出现中断和大的波折，这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在这一“黄金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猛，除了制度建设之外，还由于此时官僚资本尚未完全与国家政权相结合，致使其还没有垄断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金融资本发展比较自由，还没有形成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垄断体系。而“一战”的影响，也使得民族资本得以有发展喘息的机会。

武昌首义使中国政治体制发生强制性转换，由此带动经济体制等一系列社会体制的全面转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外源型社会，民族资本主义发生较晚，基础薄弱，且缺乏雄厚的资本市场和有序的生产经济运作规则。新式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外国资本主义，掌握着中国经济命脉。加之“一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和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步履维艰，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失衡现象便很快显露出来。

尽管如此，经过辛亥革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制度环境已经逐步形成，并不断滋养着其向前发展。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成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进入第一个“黄金时期”的最主要推动力，而武汉的经济发展则不失为其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编.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68.

[2] 自巴黎致民国军政府电.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2:547.
[3] 中华民国法令大全:农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50-51.
[4]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94-295.
[5] 黄 兴. 黄兴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1:291.
[6]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武汉市志·大事记[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56-60.
[7] 李纳森. 武昌首义与武汉城市现代化[J]. 湖北社会科学,2001,(10).
[8]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武汉市志·工业志(上册)[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9] 湖北实业月刊(第一卷)[J]. 第20号,武汉:武昌湖北实业厅,1924.
[10]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武汉经济要览[M]. 武汉: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1985:114-115.
[11]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645-646.

# The Promotion to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in Wuhan by Wuchang First-uprising

WANG Chun-lei
(*School of Econom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60, *China*)

**Abstract**: Wuchang first-uprising made Wuhan to be a center of revolution and policy in China from a famous quay. It shocked the world . Because it was the site of first-uprising, the famous leaders of Xinhai-revolution, Sunzhongshan and Huangxing put a premium on it, and did much help to its development. Hubei military government, Nanjing temporary government,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economy policies and law. It was the period of economy taking-off by government control. Wuhan benefited greatly from the economy policies and developed rapidly. If we have a survey to the development fr Wuchang first-uprising before and after, a conclusion would be made, that beside geography advantage, the institution change and institution supply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promotion to Wuhan economy development.

**Key Words**: :Wuchan first-uprising; Wuhan economy; Institutional change; economy development